

DOI: 10.19361/j.er.2026.03.08

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中国实践与发展经济学理论探索

张建华 袁嘉妮*

摘要: 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产业体系整体跃升,是“十五五”时期的重要战略任务。本文基于中国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实践,从发展经济学视角对其进行理论探索。研究梳理了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以及中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规律性认识,从理论内涵、基础支撑、动力机制三个维度分析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理论逻辑,并对传统发展经济学理论进行拓展。在此基础上,剖析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面临的瓶颈制约,提出以科技自立自强为根本驱动力、以先进制造业集群为关键抓手、以保障产业安全为战略底线、以构建一流产业生态为基础支撑的战略路径。本文旨在通过探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实践,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初步的理论探索。

关键词: 现代化产业体系;创新驱动;先进制造业集群;实体经济

中图分类号: F061.3; F269.24

一、引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指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十五五”时期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是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与此同时,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纵深推进,产业链供应链格局深度调整,围绕科技前沿、产业主导权和发展主动权的国际竞争更趋激烈。作为研究后发国家经济赶超的核心学科,传统发展经济学多以西方先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为蓝本,无论是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钱纳里的工业化阶段模式,还是格申克龙的后发优势理论,均蕴含着一种线性演进逻辑,甚至导致部分后发国家盲目追随“去工业化”浪潮,步入“产业空心化”或“脱实向虚”的陷阱(张建华、盛长文,2020)。

中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并非传统产业结构理论的简单延续,而是在深刻把握产业结构演变规律的基础上,对其内涵与逻辑的系统拓展与深化。围绕这一核心论点,本文将从以下四个方面展开论述:第二部分梳理中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实践经验,提炼中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规律性认识;第三部分从理论内涵、基础性支撑、动力机制三个维度探索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理论逻辑,并对传统发展经济学进行拓展;第四部分分析当前面临的主要瓶颈制约;第

*张建华,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张培刚发展研究院,邮政编码:430074,电子邮箱:jhzhanghust@163.com;袁嘉妮,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邮政编码:430074,电子邮箱:yuanjiani0215@163.com。

感谢匿名评审专家的宝贵意见,作者文责自负。

五部分提出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战略路径。全文旨在通过探讨我国产业结构演进规律与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实践,为建设中国特色发展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初步的理论探索。

二、中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实践与规律性认识

西方发达国家在后工业化阶段,普遍经历了制造业比重急剧下降、经济过度服务化甚至“脱实向虚”的阵痛(肖贵玉,2025)。中国同样面临产业结构变迁的拐点,但作为全球工业规模最大、工业门类最齐全的国家,中国并未盲从西方“去工业化”的传统轨迹,而是在推进新型工业化的实践中,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产业跃升之路。

(一) 两业融合的实践

面对制造业比重持续下降的现实,我国并未简单采取“保比例”的措施,而是通过推动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探索一条在结构变化中强化制造业功能的转型路径(张建华、詹闻喆,2025)。2019年以来,从战略启动到制度深化,两业融合实现了从理念倡导到制度安排的系统性落地。自推动两业融合以来,我国成功抵御了过早“去工业化”的风险。2025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稳定在25%左右,制造业规模有望连续16年保持全球第一^①。生产性服务业的赋能支撑作用也实现了跨越式发展,2025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808879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57.7%^②。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共同演进表明,制造业占比的稳定并未以牺牲服务业发展为代价,生产性服务业的快速成长恰恰得益于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以新能源汽车产业为例,2025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国内新车销量占比突破50%^③,其产业价值链中,研发设计、智能网联解决方案、电池回收等生产性服务环节的附加值增速已超过整车制造本身。此外,工业机器人行业正从单纯出售设备转向提供远程运维、系统集成等服务,行业整体营收从2020年的1061亿元增长至2024年的2378.9亿元,实现翻番^④。两业融合重新定位了制造业的功能,使其从生产制造转向制造与服务并重。

中国之所以能够避免制造业空心化与服务业低端化的困境,其深层机制在于独特的实践条件。首先,地方政府从提供“税收洼地”转向投资算力中心、标识解析节点等公共数字基础设施,这种“耐心资本”有效降低了传统制造企业向服务环节转型的沉没成本。其次,面临转型需求的庞大传统制造业,为工业互联网、研发设计等生产性服务业提供了发展空间,使服务业能够扎根于实体经济。此外,以长三角等地区为代表,熟悉工艺的产业工人与掌握算法的软件工程师同城集聚,促进了“硬件+软件”方案的协调与改进。

由此可见,中国制造业比重的稳定并未以牺牲服务业为代价。依托独特的制度条件、市场结构与社会基础,中国成功将政策红利转化为产业组织的系统升级。

(二) 中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规律性认识

中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在长期实践中,逐步形成了一些规律性认识。

①资料来源:《2025年我国工业增加值达41.7万亿元 增长较快结构向优动能向新》,载于央视网(<https://news.cctv.com/2026/01/19/ARTIwef3bkyyfYJ98BOMjhX260119.shtml>)。

②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202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载于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s://www.stats.gov.cn/sj/zxfbhjd/202602/t20260228_1962662.html)。

③资料来源:《2025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双超1600万辆》,载于中国政府网(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601/content_7054738.htm)。

④资料来源:王政、李心萍,2025:《机器人行业如何实现营收翻番》,《人民日报》11月28日第3版。

第一,制造业的核心功能不取决于其比重高低,而取决于其在经济体系中的不可替代性。中国经验表明,制造业比重的“倒U型”演变是工业化进程的普遍规律,比重下降并不必然导致地位衰落(肖贵玉,2025)。关键在于制造业是否持续发挥战略基础功能、技术外溢效应和增长引擎作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制造业在比重达峰后持续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迈进。2025年中国高技术制造业企业利润增长13.3%,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达12.5%^①。制造业内部结构持续向高端化、智能化升级,正是功能强化的生动体现。这一认识为理解“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的战略内涵提供了实践依据:所谓“合理”,不是固守某个数字,而是确保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持续发挥不可替代的核心功能。

第二,产业升级不是简单的“退二进三”,而是在三次产业深度融合中实现结构优化。长期以来,存在一种将服务业占比提升等同于产业结构优化的线性思维。中国实践打破了这一简单化认知:服务业的高质量发展,恰恰建立在制造业提供的技术装备和应用场景基础之上(张建华、程文,2019);制造业的竞争力提升,也越来越依赖研发设计、供应链管理、品牌营销等服务环节的嵌入。两业融合的政策演进表明,产业升级的本质不是三次产业的比例此消彼长,而是产业之间如何更好地协同、更高效地配置。

第三,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有机结合,是推动产业体系持续升级的制度保障。在遵循比较优势的基础上,通过战略引导、产业政策、制度供给等方式培育动态竞争优势,是中国体系建设的重要经验(赵婷、陈钊,2020)。从培育“链主”企业到支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从打造先进制造业集群到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同时,政府通过战略规划、政策引导、制度供给等方式,为产业升级创造了有利条件(张建华,2025)。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累计培育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超过1.76万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突破14万家^②。这种“市场主导+政府引导”的模式,既避免了单纯依靠行政力量导致的资源配置扭曲,也克服了完全依赖市场可能带来的市场失灵和升级迟缓。

第四,统筹发展与安全,确立大国产业的“系统集成”规律。完整性、安全性、先进性不是彼此替代的关系,而是在发展中逐步实现的功能集成。中国实践表明,完整性是安全性的基础,安全性是完整性的保障,先进性引领结构向高端攀升(黄群慧,2024)。我国是全球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这种独一无二的产业完整性,在面对近年来全球供应链断裂危机时展现出了强大的韧性;同时,为保障产业安全性与先进性,2025年我国全社会研发经费(R&D)投入超过3.9万亿元^③,在新能源汽车、5G通信等关键节点实现了从“跟跑”到“并跑”甚至“领跑”的跨越。这些功能是在应对各种风险挑战、把握科技革命机遇的长期过程中逐步积累形成的。正因如此,现代化体系建设必须坚持系统观念,在动态发展中实现多重目标的协同推进。

三、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理论逻辑

本节基于前文的实践认知,从理论内涵、基础支撑、动力机制三个维度,探索建设现代化

^①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202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载于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s://www.stats.gov.cn/sj/zxfbhjd/202602/t20260228_1962662.html)。

^②资料来源:《我国已培育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超1.76万家》,载于中国政府网(https://www.gov.cn/lianbo/bumen/202511/content_7048378.htm)。

^③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202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载于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s://www.stats.gov.cn/sj/zxfbhjd/202602/t20260228_1962662.html)。

产业体系的理论分析框架,并以此回应传统发展经济学的核心命题。

(一) 现代化产业体系的理论内涵

传统西方结构主义经济学往往陷入形而上学的框架,将三次产业的“结构比例”变迁作为衡量产业升级的唯一标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理论内涵突破了这一表象视角,实现了从“比例演进”向“功能跃升”的模式升级,这一转变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维度:

第一,现代化产业体系是生产力跃升驱动产业关系重构的必然产物。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看,传统理论忽视了生产力内部矛盾的演化。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深化,资本有机构成(c/v)呈现加速上升趋势,这意味着物化劳动(机器、智能设备等不变资本 c)对活劳动(可变资本 v)的替代效应不断增强。根据马克思的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要维持和提升产业的整体盈利率,就必须通过根本性的技术革命以大幅提高相对剩余价值率。因此,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演进,在理论逻辑上必然表现为动力机制从要素规模扩张向高水平科技创新驱动的强制性转换,从而推动组织形态走向系统集成(张建华、宋颜希,2025)。

第二,现代化产业体系是大国应对全球价值链非等价交换的物质技术基础。产业体系不仅是经济活动的场所,更是国家战略能力的核心载体。在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视域中,西方主导的全球分工体系内长期存在着“中心—外围”的剥削与依附关系。面对全球变局,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不仅是畅通国内大循环的需要,更是打破发达国家技术垄断、防范产业链“断链”风险的战略基石。这要求现代化产业体系必须具备自主可控的底层逻辑(吕越等,2024),通过前瞻布局抢占先机,推动经济向价值链高端攀升,实现从被动接受国际分工向主动构筑安全弹性的产业链主导权的提升。

第三,现代化产业体系是产业实体形态与资本循环功能的辩证统一。马克思主义强调用普遍联系和发展的观点看问题,理解现代化产业体系必须破除“三次产业割裂”的形而上学观点。制造业比重的变化只是产业资本循环形态在空间上的重组,其作为国民经济“物质生产部门”的绝对根基地位并未动摇(肖贵玉,2025)。现代服务业占比的提升,则根源于社会化大生产深化过程中,研发、设计、流通等环节从制造环节中独立出来,其目的在于更高效地完成产业资本的价值实现。制造业与服务业的深度融合与功能互补,正是现代化产业体系辩证统一特性的集中体现。

(二) 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基础支撑

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需要建立在六个相互支撑的基础之上:以实体经济为根基、以创新驱动为核心、以绿色低碳为底色、以安全韧性为底线、以融合协同为路径、以普惠共享为目标。这六个基础分别回答了现代化产业体系“靠什么支撑、朝什么方向演进、为谁服务”的根本问题,共同构成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产业体系建设的底层逻辑。

以实体经济为根基,是因为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国之本,是物质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现代化产业体系必须牢牢扎根于实体经济,避免“脱实向虚”的结构性失衡。这意味着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应保持在合理区间,先进制造业的引领作用持续增强,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形成良性互动(肖贵玉,2025)。中国实践表明,生产性服务业的快速增长得益于与先进制造业的深度融合。夯实实体根基,就是要使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每一步升级都建立在物质生产能力的坚实基础之上。

以创新驱动为核心,是因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现代化产业体系区别于传统产业体系的最本质特征,在于其增长动力从要素投入转向创新驱动(张建华、宋颜希,2025)。

这要求打通“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产业化”的全链条,实现科技与产业的深度融合,既包括关键核心技术的自主突破,也包括创新生态的系统优化,使企业成为创新主体,让市场决定创新方向,以制度激发人才活力。缺乏创新驱动,产业体系将陷入低水平同质化竞争,难以实现质的跃升。

以绿色低碳为底色,是因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现代化产业体系不应沿袭“先污染后治理”的传统路径,而应将绿色低碳作为内在约束与发展导向(黄群慧、盛方富,2024)。这要求在能源结构上向新能源转型,在生产方式上向循环经济转型,在消费模式上向绿色低碳转型。绿色转型并不会对产业施加额外负担,相反,通过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可以在生态红线范围内拓展新的增长空间。绿色本身即构成产业竞争力,低碳则代表新的发展优势。

以安全韧性为底线,是因为大国产业体系必须具备在外部冲击下抵御风险、维持运行的能力。这意味着产业链供应链的关键环节不应长期受制于人,基础设施不应存在系统性脆弱,重要产品与服务的供给不应因外部扰动而中断。安全的要义在于开放条件下实现自主可控,韧性的核心在于形成多元备份、弹性可调的产业网络,而非追求完全自给自足(邱卫东、孙昊,2026)。

以融合协同为路径,是因为现代化产业体系并非若干产业门类的简单叠加,而是相互渗透、有机协同的复杂系统。这包括三个层次的融合: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的深度融合,使制造中蕴含服务、服务中嵌入制造;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以数据要素赋能传统产业;推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使科技研发与生产应用紧密衔接(郭朝先、刘少卿,2026)。融合并不意味着边界模糊,而是在分工深化的基础上实现更高水平的协同。

以普惠共享为目标,是因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现代化产业体系应兼顾效率与公平,统筹增长与分配(张建华,2025)。这要求产业升级创造包容性就业岗位,避免低技能劳动力被简单排斥;要求产业链增值收益在区域间、群体间合理分配,缩小城乡、区域以及群体间收入差距;要求产业布局兼顾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使发展成果惠及大多数社会成员。普惠共享不仅不会牺牲效率,反而能为产业体系赢得更广泛的社会支持与更持久的增长动力。

实体经济是立足之地,创新驱动是动力之源,绿色低碳是发展底线,安全韧性是运行保障,融合协同是演进路径,普惠共享是价值归宿。六者共同构成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基石,也是中国式现代化在产业领域的具体展开。

(三) 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动力机制

从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逻辑出发,可以提炼出支撑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三大核心动力机制:供需双侧协同动力、科技创新核心动力与产业协同网络动力,三者分别从市场循环、技术突破与组织生态三个维度展开。

第一,供需双侧协同动力机制。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形成高水平动态平衡,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提供持续的市场动能。更好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增强国内大循环动力的重要路径。从供给侧看,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是核心任务;从需求侧看,将更多资金资源“投资于人”,通过统筹全生命周期资源配置、提高劳动报酬占比等方式提振消费预期,是破解“内卷式”竞争的关键举措。在实施层面,“十五五”时期要实现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等目标。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

于人紧密结合,优化公共服务配置,从根本上消除居民消费后顾之忧,并将内需潜力转化为产业升级动力。同时,坚决破除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卡点堵点,畅通国内大循环。

第二,科技创新核心动力机制。以技术革命性突破引领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提供新动能。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把科技创新摆在突出位置,以实体经济为根基,以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为主攻方向。从技术路径看,智能化有助于打通数据流动,推动生产从经验驱动转向数据驱动,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绿色化有利于突破节能降耗与清洁能源技术瓶颈,塑造可持续发展新方式;融合化则能打破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之间的边界,催生新业态,拓展新空间。

第三,产业协同网络动力机制。产业协同网络通过跨主体、跨区域的要素流动,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提供持续的组织动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需要构建起以市场、资本、技术、信息等要素跨主体、跨区域流动为基础的协同网络。产业链与创新链的双向互动,使市场需求能够反向牵引技术研发方向,技术成果落地后又反过来拓展产业空间。大企业与中小企业在分工协作中相互强化:大企业的需求释放为中小企业提供明确的市场方向,中小企业的专业化配套则支撑大企业的系统集成能力。产业生态圈的空间集聚,加速知识溢出与资源匹配,降低协作成本。这种网络化互动,使单个企业的技术突破或市场变化能够沿着链条快速传导并放大,从而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

供需双侧协同动力机制解决了现代化产业体系“为何发展”的市场动能问题,科技创新核心动力机制回答了“靠什么发展”的技术核心问题,产业协同网络动力机制则提供了“如何组织发展”的生态支撑问题。三者协同共同推动现代化产业体系在统筹发展与安全中实现高质量发展,为中国式现代化筑牢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

(四)对传统发展经济学的拓展

传统发展经济学在探讨产业体系建设时,主要依赖于对西方先行工业化国家历史演进的经验总结。西方发展经济学曾历经结构主义与新古典主义两大思潮的交替,结构主义强调政府干预和资本积累,却忽视了人力资本与市场机制;新古典主义倡导市场化、私有化,却导致了許多发展中国家“去工业化”和“遗失的二十年”(张建华、周玉雯,2021)。无论是配第-克拉克定理、钱纳里的工业化阶段理论,还是刘易斯的二元结构模型,它们更多关注产业结构历史演进的“数量比例变化”,缺乏对产业内在“质量提升”的探讨,同时也较少涉及后发国家如何通过内在目标导向实现战略赶超。中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实践,在继承传统理论合理内核的基础上,从以下四个方面对其进行拓展。

第一,从关注数量比例变化到强调质的内在演进。传统理论倾向于将产业结构变迁描述为农业、工业、服务业依次主导的比例变化,表现为一种经验性的数量规律(Clark, 1940)。中国实践表明,仅仅关注结构比例的更替是不够的,制造业比重的相对下降并不等同于功能弱化。现代化产业体系突破简单的份额增减的局限性,更加强调产业“质”的发展,即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的深度融合、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协同演进。这意味着产业升级的核心不在于以服务业在数量上替代制造业,而是在技术复杂度和产业协同能力的全面提升中,实现内在质量的飞跃。

第二,从依赖自发演进到强化目标导向与战略赶超。传统发展经济学大多假设市场自发演进是产业结构变迁的基本机制,后发国家往往被设定为依据既定比较优势进行跟随发展,政府干预往往被视为对市场的补充或矫正(Friedman, 1962; Lewis, 1955)。然而,缺乏内

在目标导向的纯自发演进,容易使后发国家陷入“低端锁定”。中国经验表明,现代化目标能够主动锚定产业发展方向。在追赶与跨越阶段,通过明确的战略目标引导,后发国家能够有效集中资源、推动核心技术突破,将短期市场行为纳入长期国家战略轨道。这形成了“目标锚定下的市场驱动”这一混合机制,弥补了传统理论在后发国家赶超动力分析上的不足。

第三,从要素禀赋驱动到供需双侧的高水平互动。传统发展经济学及经典增长理论在解释经济与产业演进时,常侧重于资本积累、技术进步等供给侧要素的驱动(Solow, 1956; Romer, 1986; Lucas Jr., 1988)。虽然以罗默和卢卡斯等为代表的新增长理论深刻揭示了内生技术进步的巨大意义,对当今产业发展依然具有核心指导价值,但在具体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过程中,“超大规模市场需求如何反哺和催生内生创新”的作用机制仍需进一步拓展。中国依托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不仅在供给侧推动技术内生,更在需求侧通过高端需求引导技术升级、细分需求推动专业分工、新兴需求带动新业态成长。这种供需双向互动的逻辑,使得产业体系的演进获得了更强劲的内生动力。

第四,从单纯的效率优先到发展与安全的动态统筹。传统发展经济学多基于全球自由贸易的假设,强调资源配置的效率最大化,较少关注极端外部冲击下的产业安全与自主可控问题(List, 1856)。在当前全球产业链深度重构的背景下,中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将安全韧性作为底线约束,强调在开放合作中实现关键核心环节的自主可控。对于人口规模巨大、产业门类齐全的大国而言,单纯追求静态比较优势可能带来系统性风险,在效率与安全之间寻求动态平衡,是传统产业理论未曾深入探讨的新时代课题。

综上所述,现代化产业体系的理论建设在吸收传统发展经济学及内生增长理论合理内核的基础上进行了拓展。这一理论框架将产业变迁从数量比例变化深化为质的内在演进,将发展路径从自发跟随转向目标导向下的战略赶超,突出供需双侧的良性互动,并将统筹发展与安全纳入核心逻辑,为发展经济学贡献了来自中国经验的新命题与新视角。

四、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亟待突破的瓶颈制约

上述实践经验表明,中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遵循着一条从规模扩张向结构优化递进的发展路径。然而,当产业发展完成量的积累阶段,深层次的质效矛盾便成为决定其能否实现跃升的关键。当前,我国产业体系“大而不强”“全而不优”的结构性短板日益凸显,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的堵点尚未打通,要素配置的市场化障碍与区域协同困境相互交织。这些问题是迈向高质量发展必须破解的核心命题。

(一) 产业体系“大而不强”的结构性短板

我国产业体系在规模扩张的背后,存在着质量提升滞后的矛盾。这种“大而不强”的结构性短板,在产业链基础能力、高端供给格局与产业组织形态三个层面表现得尤为突出。

一是基础能力薄弱制约产业根基。在基础零部件和元器件、基础材料、工业基础软件、基础制造工艺及装备、产业技术基础“五基”领域,我国与国际先进水平存在系统性差距。在关键基础材料方面,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对全国30多家大型企业130多种关键基础材料的调研,我国32%的关键材料仍为空白,52%依赖进口^①。这种“卡脖子”隐患意味着一旦面临

^①资料来源:辛国斌,2018《中国制造业核心技术短缺局面尚未根本改变》,载于中国新闻网(<https://www.chinanews.com.cn/cj/2018/07-13/8565912.shtml>)。

外部地缘政治风险,庞大的中下游产业链随时面临“断链”与“停摆”的生存危机。二是高端供给不足导致价值链“低端锁定”风险。在高端装备、精密仪器、关键材料等战略性领域,我国产品的技术性能、质量稳定性、品牌认可度与国际领先水平存在显著差距。我国虽在诸多制造领域拥有规模优势,但高端市场长期被国际巨头主导,国产产品主要集中于中低端应用,在高端场景渗透率不足。这种高端供给能力的缺失,不仅导致大量附加值流向国外,更使产业链关键环节受制于人,难以向上游研发设计和下游品牌服务等高附加值环节拓展。三是产业组织分散削弱竞争合力。在汽车、钢铁、化工等规模经济显著的行业,我国企业数量众多但规模偏小,行业集中度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以钢铁行业为例,2024年,我国前十家钢铁企业粗钢产量集中度(CR10)仅为43.7%。相比之下,成熟市场呈现出典型的寡头格局:韩国前两家企业(CR2)占比约88%,日本前两家企业(CR2)占比约80%(中国钢铁工业协会企业改革与管理委员会课题组,2026)。这种产业组织格局导致资源分散、重复建设、恶性竞争等问题突出,难以形成规模效应和协同效应。分散的产业组织不利于集中力量进行关键技术攻关,也不利于培育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领军企业,导致我国企业在全价值链分工中往往处于被动接受者地位,缺乏话语权和定价权。

(二) 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衔接不畅

如果说“大而不强”是产业体系自身的问题,那么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之间的存在堵点,则是制约产业体系向“强”迈进的核心症结。

一是基础研究支撑不足且转化机制不畅。长期以来,我国研发投入总量虽大,但投入结构存在明显失衡。2024年基础研究经费占全国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投入比重为6.88%^①,远低于发达国家15%至25%的水平^②。有限的基础研究投入在产出端面临突出问题:由于科研评价体系过度偏向论文、课题等学术指标,基础研究成果向产业技术应用的转化通道受阻,针对国家战略产业“卡脖子”环节、由重大工程技术痛点逆向牵引的应用基础研究难以获得足够的资源与评价认可。这导致前沿技术攻关缺乏底层科学原理的有力支撑。二是科研评价体系滞后导致产学研脱节。当前,高校及科研院所的创新活动主要遵循单一的学术评价导向(如论文发表量、课题立项数),其研究旨在过度偏向理论层面的“新颖性”与“学术价值”,相对忽视技术成果在工业应用中的工艺稳定性、中试熟化可行性及成本经济性。这种价值取向的割裂,使得即便在目标导向型基础研究领域,选题也容易偏离产业真实需求,造成大量科技成果存在工程转化缺陷,最终以专利或论文形式“沉睡”,难以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三是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尚未完全确立。理论上,企业最贴近市场,最了解技术需求,应当是技术创新的主体。但现实中,我国企业创新能力参差不齐,多数企业研发投入不足、技术积累薄弱,尚未形成持续创新的内生动力。领军企业在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领域的布局有限,对产业链创新资源的整合能力有待提升。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格局尚未真正形成,协同创新的制度机制仍需完善。

(三) 要素配置与产业生态存在系统性障碍

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健康运行,需要要素资源高效配置、产业生态协同支撑。当前,在要

^①资料来源:《2024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载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网站(https://www.most.gov.cn/xxgk/xinxifenlei/fdzdgnr/kjtjbg/kjtj2025/202509/t20250930_194823.html)。

^②资料来源:陈炜伟,2017:《我国研发经费投入强度接近发达国家水平》,载于新华网(https://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7-10/10/c_1121782134.htm)。

素市场化配置和产业生态建设方面,仍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是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尚需深化。劳动力、资本、土地、技术、数据等要素市场发育不平衡,阻碍要素自由流动的壁垒依然存在(韩文龙等,2024)。劳动力市场方面,户籍制度等因素制约了人力资源在区域间的优化配置;资本市场方面,直接融资比重偏低,早期科技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依然突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有待提升;数据市场方面,确权难、定价难、交易难等问题尚未有效解决。这些要素配置的系统性障碍,使得要素资源难以被配置到效率更高的领域。二是区域产业同质化竞争问题突出。部分地区在产业规划上缺乏科学论证,导致产业同质化严重、产能过剩问题突出。与此同时,地方保护、市场分割现象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存在,制约了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形成(龚六堂,2026)。三是产业生态有待优化。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的格局尚未完全形成,领军企业的辐射带动作用有待增强,中小企业在产业链配套中的专业化能力有待提升。知识产权保护仍需加强,创新激励机制有待完善。这些问题共同制约着产业体系的整体运行效率和持续创新能力。

五、中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战略抓手

现代化体系建设必须统筹发展与安全,突破传统路径依赖,打造与中国式现代化特征相匹配的产业体系,承担起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绿色转型、安全发展、融合协同、普惠共享六大核心使命。基于此,本文坚持问题导向,从以下四个方面提出突破路径:

(一)以科技自立自强为根本驱动力,打造产业发展新动能

进入新发展阶段,我国产业发展面临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的紧迫任务。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迈向价值链中高端,是破解“大而不强”质效困境的根本途径(张建华,2024)。发展新质生产力,核心要义正是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使科技自立自强从应对风险挑战的被动选择,真正转变为打造产业竞争新优势的主动战略。

一是强化基础研究源头供给,夯实创新根基。推动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双向贯通,建立从科学发现到技术突破再到产业化的全链条联动机制,使基础研究成果更高效地转化为产业发展新动能。二是完善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机制,提升自主可控能力。推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从“单点突破”向“系统集成”转变,加强跨领域、跨行业协同攻关,着力解决创新发展中的卡点堵点问题,抢占科技制高点。三是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激发创新活力。促进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支持企业主导产学研融通创新,构建企业“出题、答题、阅卷”一体贯通的创新闭环。四是畅通科技成果转化通道,实现创新链产业链无缝对接。打破“先有成果后转化”的思维惯性,推动形成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一体谋划、一体部署、一体推动的新格局,打通从科技强到产业强、经济强、国家强的通道。

(二)以先进制造业集群为关键抓手,锻造产业竞争新优势

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核心在于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十五五”规划提出,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以先进制造业集群为抓手推进产业体系建设,既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融合协同使命的重要体现。

一是推动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升级。推动传统产业改造提升,与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发展形成良性互动,以传统产业升级为新兴产业提供应用场景和基础支撑。二是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推动新兴产业从单点突破向规模化发展迈进,在新兴

支柱产业领域构建完整的产业链生态,提升国际竞争力。三是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开辟发展新赛道。建立常态化未来产业技术预见机制,推动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机制和风险分担机制,大力发展“耐心资本”,破解“敢不敢投”的现实顾虑。四是打造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强化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原始创新策源功能、高端产业引领功能和顶尖人才集聚功能,打造科技强国建设的战略支点。

(三) 以优化国际分工与保障产业安全为战略底线,拓展产业发展新空间

构建更具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在开放合作中增强多元化布局和风险分散能力,是安全发展使命的核心要求,也是现代化产业体系长期稳定发展的根本保障。

一是提升在国际分工格局中的地位。推动从“被动融入”向“主动引领”转变,鼓励企业在全产业链重构中占据关键节点,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和话语权。二是构建多元稳定的供应格局。强化底线思维与极限思维,完善风险预警、压力测试与应急响应机制,探索建立“产业链压力测试”的规制框架,使安全治理前置化、制度化、法治化。三是推动制度型开放。从国际规则的被动接受者转向主动参与者,将我国在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领域的先发优势转化为制度性的话语优势。四是建立健全风险防控体系。推动安全治理从“事后救济”向“事前预防”重心前移,将关键零部件备份、自主供给率底线等要求通过制度化的方式转化为企业责任,实现在增长支撑下保障安全,并内嵌风险防控机制,推动高质量发展。

(四) 以构建一流产业生态为基础支撑,激发市场主体新活力

良好的产业生态是现代化产业体系健康运行的基础保障。“十五五”规划提出,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坚决破除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卡点堵点,破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促进商品要素资源在更大范围内顺畅流动。这既是普惠共享使命的必然要求,也是融合协同使命的重要支撑。

一是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以“五统一、一开放”为基本要求,统一市场基础制度、统一市场基础设施、统一政府行为尺度、统一市场监管执法、统一要素资源市场,持续扩大开放,真正把市场规模优势转化为资源要素的强大吸引力。二是强化关键要素支撑保障。推动科技、产业、金融、人才“四链融合”,以要素集聚厚植产业发展生态,形成创新引领、要素集聚、因地制宜、监管有效的发展生态。三是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坚决遏制低价低质量竞争,强化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司法,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秩序。四是促进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加快培育一批“小巨人”企业和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构建龙头企业引领、中小企业协同的产业共同体,提升产业链整体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五是完善产业治理体系。强化产业与财税、金融等政策协同,提升高质量标准体系化供给能力,通过高质量的制度供给将产业安全风险转化为规范化的治理效能,推动形成产业治理能力现代化与市场主体活力竞相迸发的良性循环。

参考文献:

1. 龚六堂,2026:《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受限的深层次原因探究——基于地方政府支出责任的视角》,《改革》第1期。
2. 郭朝先、刘少卿,2026:《融合化: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发展方向》,《中国经济时报》1月16日第2版。
3. 韩文龙、张瑞生、赵峰,2024:《新质生产力水平测算与中国经济增长新动能》,《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第6期。
4. 黄群慧,2024:《中国全面推进产业体系完整性先进性安全性》,《中国经济时报》1月24日第8版。
5. 黄群慧、盛方富,2024:《新质生产力系统:要素特质、结构承载与功能取向》,《改革》第2期。
6. 吕越、张昊天、高恺琳,2024:《人工智能时代的中国产业链“延链补链”——基于制造业企业智能设备进口

- 的微观证据》,《中国工业经济》第1期。
- 7.邱卫东、孙昊,2026:《健全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的时代意蕴、现实境遇与实践遵循》,《经济学家》第1期。
- 8.肖贵玉,2025:《保持我国制造业合理比重是个重大问题》,《求是》第22期。
- 9.张建华,2024:《创新驱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研究》,科学出版社。
- 10.张建华,2025:《创新引领中国产业体系跃升》,《中国社会科学报》10月21日第3版。
- 11.张建华、程文,2019:《服务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中国社会科学》第3期。
- 12.张建华、盛长文,2020:《产业结构变迁及其经济效应研究进展》,《经济学动态》第10期。
- 13.张建华、宋颜希,2025:《创新驱动下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从“全”到“强”的跨越》,《城市问题》第12期。
- 14.张建华、詹闻喆,2025:《服务型制造模式与企业产品创新》,《经济学动态》第8期。
- 15.张建华、周玉雯,2021:《基于中国实践的发展经济学理论创新》,《学术月刊》第11期。
- 16.赵婷、陈钊,2020:《比较优势与产业政策效果:区域差异及制度成因》,《经济学(季刊)》第3期。
- 17.中国钢铁工业协会企业改革与管理委员会课题组,2026:《从美欧日的产能治理经验看我国钢铁行业防“内卷”思路和举措》,《中国钢铁业》第1期。
- 18.Clark, C. 1940. *The Conditions of Economic Progress*. London: Macmillan.
- 19.Friedman, M. 1962. *Capitalism and Freedo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20.Lewis, W. A. 1955.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 Southampton: CRC Press.
- 21.List, F. 1856. *National System of Political Economy*. Philadelphia: J.B. Lippincott & Company.
- 22.Lucas Jr., R. E. 1988. “On the Mechanic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22(1): 3-42.
- 23.Romer, P. M. 1986. “Increasing Returns and Long-Run Growt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4(5): 1002-1037.
- 24.Solow, R. M. 1956. “A Contribution to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70(1): 65-94.

China's Practice of Building a Modern Industrial System and Theoretical Exploration in Development Economics

Zhang Jianhua^{1,2} and Yuan Jiani¹

(1: School of Economics,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 Peikang Chang Institute for Development Studies,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bstract: Building a modern industrial system and achieving an overall leap in the industrial system are important strategic tasks during the 15th Five-Year Plan period. Based on China's practice in constructing a modern industrial system, this paper conducts a theoretical explor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It reviews the regular understanding of the integration of advanced manufacturing and modern service industries as well as China's construction of a modern industrial system, analyzes the theoretical logic of building a modern industrial system from three dimensions—theoretical connotation, basic support, and driving mechanism—and extends traditional development economics theories. On this basis, it examines the bottlenecks and constraints fac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 modern industrial system, and proposes strategic pathways: taking self-reliance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s the fundamental driving force, taking advanced manufacturing clusters as the key lever, taking ensuring industrial security as the strategic bottom line, and taking building a first-class industrial ecosystem as the basic support. This paper aims to provide a preliminary theoretical exploration for constructing an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by discussing the practice of building a modern industrial system.

Keywords: Modern Industrial System, Innovation-driven Development, Advanced Manufacturing Clusters, Real Economy

JEL Classification: O14, L16, L52

(责任编辑:彭爽)